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适用性研究*

尚勇敏¹, 鲁春阳², 曾刚¹

(1.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241; 2. 河南城建学院, 河南平顶山 467001)

摘要: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总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 本文从要素、制度、关系三个维度, 按照经济发展相对绩效水平,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适用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 资源驱动型模式适用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人力资本驱动型模式适用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 市场主导型模式的经济绩效均优于政府主导型, 而政府主导型模式仅在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的传统经济阶段和工业化初期具有相对适用性; 外生与内生因素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应向着整合全球力量、国家机构和当地环境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要素-制度-关系; 阶段适用性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经济发展的崛起激发了许多学者的思维与想象, 全球化时代, 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 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也方兴未艾^[1]。费孝通(1985)指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就是特定区域在一定历史条件, 独自探索出的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 是地区经济发展实践主要特征的综合反映^[2]。自从1983年费孝通提出“苏南模式”之后, 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浦东模式、天津模式等概念相继提出; 国外学者也从不同视角、不同区域界定了东欧模式、拉美模式等。

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可变性,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处于不断的动态演变之中, 没有或很难存在永恒的发展模式^[3]。正如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 东亚地区出现了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现象和运行方式, 这也被称之为“东亚模式”^[4]。但20世纪90年代, 日本首先在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中出现泡沫经济, 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经济产业传递与升级出现减缓, 这也标志着“东亚模式”的破灭。Kurt Weyland(1999)指出, 拉美地区通过

实施“外资依赖型”的贸易替代模式和进口替代战略, 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但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 由于在经济快速发展中经济社会体制与发展方式调整与转变缓慢, 忽视了财富分配与社会进步, 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6]。Gary Gereffi(2009)以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的典型国家中国和墨西哥为例, 对中国和墨西哥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对比, 近30年来, 中国经济不断多样化, 出口额不断增长; 而新自由主义下的墨西哥, 是拉美经济最多样化和最外向型的经济体^[7], 却出现了经济缓慢增长、失业率高、收入不平等、社会恶化、政治抗议严重等, 新自由主义受到了质疑^[8]。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 苏南、温州等将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在当时分权式改革背景下, 以及特定的发展阶段、特定的经济区域和特定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形成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9]。而随着所有制理论的突破、国企改革的深化、企业产权制度的完善, 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的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重大变化^[10], 并遇到不同程度的问题与挑战。为此, 苏南、温州通过大力发展适应和促进先进

作者简介: 尚勇敏(1986-), 男, 四川江油人, 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发展模式创新; 鲁春阳(1979-), 女, 河南平顶山人,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国土经济与区域规划; 曾刚(1961-), 男, 湖北武汉人,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院院长, 研究方向为生态文明与区域发展模式、创新网络与产业集群。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编号: 10ZD&016), 主持人: 曾刚; 上海市科委科技支撑计划“崇明生态岛建设指标体系的优化研究”(编号: 13231203400), 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行动计划”(编号: PY2014002), 主持人: 尚勇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层级式产业集群内部技术权力突破与创新升级研究”(41371147), 主持人: 林兰。

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形成了“新苏南模式”和“后温州模式”^[11],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原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消亡。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在对温州模式的研究中指出,由于近年来温州经济发展遭遇了“天花板效应”^[12]。史晋川指出温州区域经济的发展从产业演进的角度来看,不仅可能会被锁定,还可能发生“产业空洞化”;届时,温州模式将被更加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式所取代^[13]。

一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总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以及当地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禀赋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阶段适用性。这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推广的边界性条件,任何逾越这种阶段适用性的做法,复制超前或过时的模式都将导致经济发展弊端的出现。而我国学术界、政界总热衷于对国内外各种模式进行了探讨,寄希望于通过将该模式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其他地区,但这类研究往往忽视了其阶段适用性。为此需要充分考虑该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选择适当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制度、关系三个维度将各种模式进行了分类,分析资源驱动型与人力资本驱动型、政府推动型与市场推动型、内生型与外生型模式的绩效水平,进而分析不同模式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适用性,以期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方向。

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划分

人类对外界的认识是通过概念和范畴来获得的,外界事物的性质只有通过概念化以后,才能成为人们认识的对象。人们获得关于外界事物本质的认识,应该是经过重新组合建构起来的,而不是进行机械描摹;为此,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认识应该深入其内在本质属性,避免在概念上和命名上反复地打转。而判断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适用性,也不应停留在对模式本身适用性的探讨,而应解释该模式所代表类型的阶段适用性,这样的分析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的更富价值。为此,需要对中国若干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概念化地类型划分。

(一) 三维结构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Acemoglu、Wei、Yang、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等国内外大量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划分的研究,也主要是从要素结构^[14]、制度环境^{[15][16]}、内外生关系^[12]等三个维度入手。但他们大多只关注了一方面或部分方面。本文则在其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归纳综合,从三个维度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进行系统

分类。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多维的复杂系统,一种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既离不开要素的驱动,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也离不开内生与外生的关系。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划分标准不是排他性的,如珠江模式、苏南模式等从三个维度进行均可以进行划分。为此,本文在对现有研究进行综合归纳,建立“要素-制度-关系”三维分析框架,根据三个维度的不同组合方式,将其划分为8种类型(图1),每个区域代表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三个维度的不同组合,进而可以概念化地划分为“资源-市场-内生型”模式(RME_n)、“人力资本-市场-内生型”模式(HME_n)、“资源-市场-外生型”模式(RME_x)、“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HME_x)、“资源-政府-内生型”模式(RGE_n)、“人力资本-政府-内生型”模式(HGE_n)、“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RGE_x)、“人力资本-政府-外生型”模式(HGE_x)等8种模式^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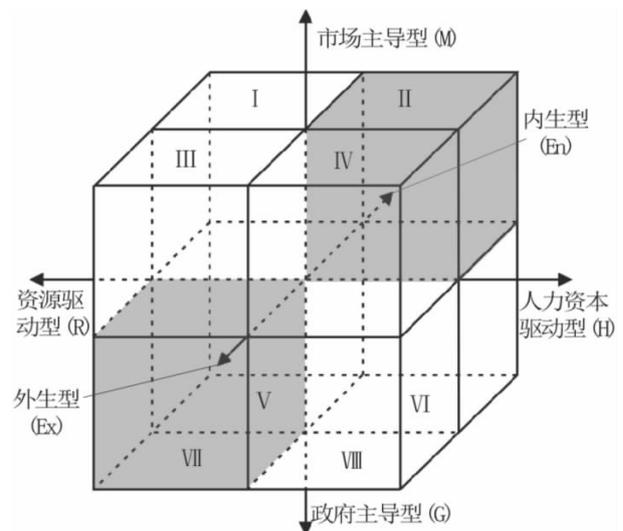


图1 三维结构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二) 样本选择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五花八门,有省级、城市级、乡村级等多个尺度。城市作为生产型企业和人口的聚集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的重要空间依托,也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产生的主要空间尺度^[17];而且,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也大多数是从城市作为切入点。为此,将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尺度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尚勇敏(2015)指出,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具备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发展模式具有示范性,并具有一定边界性三个条件^[18],本文依据这三个原则对与研

① 模式类型简称 R、H、M、G、En、Ex 分别为 Resource、Human-capital、Market、Government、Endogenous、Exogenous 的首字母。

究样本进行筛选。同时,剔除具有重叠性的模式,如晋江模式包含于泉州模式;由于县级统计资料缺乏,用金华模式代替义乌模式。经过筛选,得到16种模式^②。

(三)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各城市历年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13》和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由于地市级数据的统计本身存在较大的困难,表现在统计口径存在差别、部分年份数据缺失等。首先,由于城市统计数据相对不够完整,对于部分的缺失数据,本文采用插值法或者回归法进行估计,确保数据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其次,由于城市数据的统计起止时间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中大部分城市数据起止时间选择1987-2012年,因为20世纪80年代也是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等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时期。而长沙、贵阳、重庆、大连、鄂尔多斯数据的起始点分别为1992、1992、1997、1997、1997年,而这些模式大多是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或21世纪初期,在数据上能保证演变过程的完整性^③。

(四)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定量划分标准

1. 要素维度划分标准

Acemoglu等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可视为“物”的资本和非“物”的资本,这些资本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要素^[14],张复明(2008)、赵康杰(2009)等则进一步将工业分为以自然资源资本为主导的工业部门和以人力资本等为主导的工业部门^{[19][20]}。依据Acemoglu和张复明等的观点,假定工业内部只有资源经济部门与人力资本经济部门^④,二者分别对应的是资源驱动型模式和人力资本驱动型模式。对于资源型产业的界定,本文采用陆大道(1995)的研究^[21]。由于缺乏对资源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和人力资本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公认的定量刻画指标,为此,本文特定义“产业结构比”指标,计算公式为:

$$CYJG = \frac{\text{资源型产业工业总产值}}{\text{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 - \text{资源型产业工业总产值}}$$

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产业结构比大于1,说明资源型产业在工业中占据优势,本文将该模式定义为资源驱动型模式;若低于1,则为人力资本驱动型模式。

2. 要素维度划分标准

制度变迁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条主要演化路

径,所有制结构、市场化程度则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的集中体现。一般来说,国有制占比越高、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越强,反之市场作用更强。市场化程度是反映资源配置经济决策市场化广度和深度的重要指标,本文参考金玉国提出的市场化指数中的生产要素市场化指数(SCH)^[22],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其他投资”三项指标的比重,因为这三项投资的规模基本上由市场决定,其比重大小大致反映了投资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其公式为:

$$SCH = \frac{\text{利用外资总额} + \text{自筹投资额} + \text{其他投资额}}{\text{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所有制结构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两种力量的重要指标,国有控股企业及集体企业占比越大,该区域的经济越依赖于政府;反之,说明市场力量的推动作用越强。本文特定义“非公有化率”指标,即非公有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计算公式为:

$$FGYH = \frac{\text{全行业工业总产值} - (\text{国有及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 + \text{集体企业总产值})}{\text{全行业工业总产值}}$$

为了保持量纲的统一,对两项指数进行加权,权重分别为0.5、0.5,进而可得到 $I = 0.5 * SCH + 0.5 * FGYH$;指数越大,说明市场对于经济发展作用越强,反之,政府作用越强。若该指数大于0.5,将该模式界定为市场推动型模式;反之,为政府推动型模式。

3. 关系维度划分标准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全球化与地方化两种力量此消彼长。外生型模式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更加依赖于国外市场,外贸、外资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相对较高。而内生型模式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更加依赖于本国市场与资金,走的是内生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2006)依据资源、市场的内外生关系,也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分为“内源拉动”和“外源拉动”模式^[12]。本文特借鉴李远(2006)在《政策导向与外向型经济发展》中的观点^[23],通过开放度来衡量某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倾向于内向型还是外向型,其计算公式为:

$$Q = \frac{(X + M)}{GDP} \times 100\%$$

其中,Q为开放度;X为当年出口额;M为当年进口额;GDP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这里以10%作为划

② 文中的16种模式并未涵盖中国所有的模式,但力求通过有限的样本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作力所能及的探讨。

③ 数据起止年份并不完全代表该模式形成的生命周期,而是用尽量长的时间序列数据,相对完整地反映该模式的演变过程。

④ 这里的人力资本经济部门主要是指不以原材料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要素,而以人力资本、以及附加在人上的技术、知识等高级要素投入为主要驱动要素。

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内生型与外生型的界限，若经济外向度高于10%，则将其划分为外生型模式，反之，则为内生型模式。

指标选择不合理、研究方法失当一直是国内各种评价、定量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指标选择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即从评价对象的本质出发选择相应指标；二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即通过对大量指标进行分析，筛选出最合适的指标。与其漫无边际地选择指标，不如选择与研究对象、评价目标关

联最强的指标，既紧扣评价目标，又能减少指标的共线性。本文在三个维度采用了较为单一的指标，但若建立看似综合全面的指标体系对其进行判断，又难免陷入因指标选取的主观性造成分析结果的偏差；为此，本文选取最能体现出三种模式特征的单一指标对其进行划分，尽管选取指标难以得到公认，旨在尚无公认标准的情况下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的划分作一定的探讨。通过以上方法，可对1987-2012年间各模式进行概念化类型划分（见表1）。

表1 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

模式	1987年	1992年	1997年	2002年	2007年	2012年
泉州	RGE _n	RGE _x	RME _x	RME _x	RME _x	RME _x
东营	RGE _n	RGE _n	RME _n	RME _n	RME _x	RME _x
天津	RGE _x	RME _x	HME _x	HME _x	RME _x	RME _x
大连	—	—	RME _x	HME _x	RME _x	HME _x
青岛	RGE _n	RGE _x	HME _x	HME _x	HME _x	HME _x
上海	RGE _x	HGE _x	HGE _x	HME _x	HME _x	HME _x
金华	HGE _n	RGE _n	HME _n	HME _x	HME _x	HME _x
温州	HME _n	HME _n	HME _x	HME _x	HME _x	HME _x
深圳	HME _x					
东莞	RGE _x	HME _x				
苏州	RGE _n	HGE _n	HME _x	HME _x	HME _x	HME _x
鄂尔多斯	—	—	RGE _n	RGE _x	RME _n	RME _n
长沙	—	HME _x	HME _x	HME _x	HME _x	HME _n
重庆	—	—	RGE _n	HGE _n	HME _x	HME _x
贵阳	—	RGE _n	RGE _x	RGE _x	RME _x	RME _x
西安	RGE _n	RGE _x	HGE _x	HGE _x	HME _x	HME _x

注：由于各模式数据的起始时间不同，使得部分模式在部分年份未作类型划分。

三、实证研究

与其分析温州、东莞等某种具体的模式在不同阶段的适用性，不如分析该模式所揭示内在规律及其适用性；为此，本文将16种模式，从要素、制度、关系三个维度进行分类，分析资源驱动型与人力资本驱动型、政府推动型与市场推动型、内生型与外生型模式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适用性。

（一）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阶段演变

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对于经济发展阶段评判，国内外许多学者采取了不同方法对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其划分方法大致分为两种，一是绝对指标划分方法，即依据世界经济发展标准对

各个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定位，该方法对于各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时空比较较为适用。二是相对划分，这种方法主要针对于一定国家或地区时间上的演变，以及针对单个时间节点的不同地区进行横向比较，严格地讲，这种划分属于类别划分，而不是阶段划分。为此，本文更倾向于绝对指标划分法的观点，这里采用《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2）》提出的方法^⑤，即将经济发展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5个阶段，采用人均GDP、三次产业比重、城镇化率、R&D经费占GDP比重四个指标，各阶段标志值参考文献[24][25]。其中，人均GDP为以采用汇率—平价法折算

⑤ 限于篇幅原因，本文对《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中提出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阶段阈值法不详细展开。

后的美元，汇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2》，平价指数采用文献 [26] 中的研究结果。由于标志值中的人口城镇化率以常住人口统计，但城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数据难以获取，对此本文对该标志值进行修正，中国 2010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49.95%，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34.17%，二者的比值为 68.41:100，进而本文尝试通过该系数对报告中的标准进行

修正。考虑到划分标准的表现形式，本文将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阶段的分割点设定为整数，即 20%、35%、40%、50%。通过以上方法，可将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不同年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见表 2）。

表 2 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发展阶段演变

年份	工业化阶段			后工业化阶段
	工业化初期	工业化中期	工业化后期	
2012			天津、苏州、东莞、东营、西安、鄂尔多斯、长沙、贵阳、重庆、金华、温州	上海、深圳
2007		长沙、贵阳、重庆、金华、泉州、温州	上海、深圳、天津、苏州、东莞、东营、西安、鄂尔多斯	
2002	东莞、重庆、泉州、温州	天津、苏州、东营、西安、鄂尔多斯、长沙、贵阳、金华	上海、深圳	
1997	东莞、鄂尔多斯、贵阳、重庆、金华、泉州、温州	深圳、天津、苏州、东营、西安、长沙	上海	
1992	苏州、东莞、东营、贵阳、金华、温州	上海、深圳、天津、西安、长沙		
1987	苏州、东莞、西安、金华、泉州、温州、东营	上海、深圳、天津、		

注：由于大连、青岛缺乏户籍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数据，本部分内容中不涉及大连和青岛。研究时段内没有地区处于前工业化阶段，故表中未列举前工业化阶段。

(二) 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绩效演变

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效率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绩效是在效率概念上的延伸。按照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的投入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而 GDP 是反映经济产出最主要的指标，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绩效的实质问题是如何将投入资源进行合理有效地配置。为此，可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绩效定义为：一定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产出相对于经济发展投入的有效程度。如果经济发展不具有成长性，模式也自然是空口而谈；国内外形成的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无一不是因为其在较长时期内经济保持稳定的发展^[18]。为此，本文采用 DEA 法作为各种模式经济发展绩效的评价方法，

并将区域经济发展视为一个系统，从投入、产出两方面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评价指标体系，其投入指标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全社会从业劳动力总量、R&D 经费支出，分别表征资金、劳动力、技术的投入，而产出指标为 GDP 总量。

数据来源于 1987—2013 年各城市统计年鉴，固定资产投资、R&D 经费、GDP 采用当年价。由于固定资产投资、R&D 经费投入产生效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学术界一般认为滞后期为 1 年^[27]，因此本文中的产出指标为 t 年数据，投入指标中固定资产投资、R&D 经费为 $t-1$ 年数据，而全社会从业劳动力总量仍为 t 年数据。由于统计口径等问题，造成部分城市部分年份数据缺失，这里通过插值法、前后两年

平均值等途径代替, 以确保数据的相对完整性。

通过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1987—2012 年绩效水平演变分析, 可看出不同模式在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绩效水平具有较大差异。但总体上, 各模式的经

济发展绩效高于中国平均水平, 这也反映出本文所选择的模式在经济发展绩效较优, 并体现了经济发展应具有“可持续性”的标准。

表 3 1987 - 2012 年各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绩效

	1987	1992	1997	2002	2007	2012
长沙	—	0.832	0.680	0.741	0.763	0.745
重庆	—	—	0.614	0.522	1.000	0.735
大连	—	—	0.684	0.716	0.836	0.745
东莞	1	1	1	1	0.997	1
东营	0.957	1	0.769	0.613	1	0.721
鄂尔多斯	—	—	0.360	0.478	1	0.965
贵阳	—	0.773	0.569	0.416	0.818	0.766
金华	0.703	0.896	0.635	0.483	0.837	0.685
青岛	1	0.906	0.825	0.704	0.768	0.663
泉州	0.536	1	0.865	1	0.963	1
上海	0.714	0.802	0.702	0.548	1	0.945
深圳	1	0.798	1	1	1	1
苏州	1	0.696	0.636	0.744	0.975	0.948
天津	0.551	0.547	0.540	0.594	0.993	0.708
温州	1	1	1	0.834	0.890	0.943
西安	0.419	0.639	0.660	0.525	0.443	0.569
中国	0.616	0.594	0.551	0.608	0.634	0.663

注: 表中为各地区经济发展绩效的横向比较, 对于某个地区历年经济发展绩效不具有可比性。

(三)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适用性分析

一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总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 随着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 经济发展模式也在不断变化之中; 可见, 任何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 即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发挥较强的优势, 但随着这种模式优势减弱, 也意味着这种模式即将走向消失。诚然, 不同城市应综合考虑当前的经济条件和功能定位选择适合自身的经济增长方式,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也类似; 任何适当的、成功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都是建立在对经济基础、功能定位等因素进行客观、准确分析, 力求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前提之上的。只有认清不同其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 选择当下最优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是其现实选择^[17]。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适用性有若干判断指标, 而经济发展绩效水平可作为判断模式适用性的重要指标。本文从要素、制度、关系三个维度对经济发展模式平均绩效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进行分析, 为此, 对三维结构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绩效水平, 本文分别从三个维度分析其相对绩效水平演变。

从图 2 可看出, 各模式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平均绩效呈“U”型分布, 即在经济发展初期实现低投入、低产出的绩效水平相对较高, 经济发展中期表现为高投入、低产出的绩效水平较低, 经济发展后期则表现为低投入、高产出的绩效水平相对较高。

从要素维度上看, 资源驱动型模式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具有相对较高的经济绩效水平。由于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 经济发展对资源依赖程度较高, 资源驱动型模式以相对较低的投入带来较高的产出, 使得其绩效水平高于人力资本驱动型。但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 人力资本驱动型模式的优势开始凸显出来, 其绩效水平超过资源驱动型模式。可见, 资源驱动型模式短期经济效应更加明显, 尤其是在对自然资源需求较大的工业化前中期阶段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而人力资本驱动型达到长期经济效应更加明显, 尤其是在工业化中后期或后工业化阶段, 其优越性逐渐显现。

从制度维度上看, 市场推动型模式的绩效水平一直高于政府推动型模式, 这也反映出市场经济在资源优化配置上的优越性。尽管在传统经济阶段和工业化

初期阶段，政府推动型模式具有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绩效，但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及后工业化阶段以后，依靠政府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需求不相适宜。综合看来，在任何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推动型的经济发展绩效均优于政府推动型。

从关系维度上看，在工业化初期，依赖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源全球配置效应，外生型模式在绩效水平上高于内生型模式，而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以后，二者差异不大。由于工业化中期以后内生模式相对较少，本文中仅有东营、鄂尔多斯和长沙仍为内生型模式，但也能通过相对较少的样本反映内生型模式的绩效水平。对于二者孰优孰劣，不能简单地进行判断。全球生产网络学派强调全球商品链、全球商品链等外

生性的全球链接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意义，而新区域主义则强调一定区域范围内劳动力、技术、社会文化、制度因素、集聚经济等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二者均强调地方资产在全球化时代的作用，并认为熟练工人、生产网络、技术基础设施在知识形成、交换、处理、传播和溢出的效应^[28]。可见，外生与内生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以致 Bathelt (2004)、Wei Y H D (2010) 等一大批学者提出区域发展应整合全球力量、国家机构和当地环境等^{[29][30]}。这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绩效水平、对外贸易依存度上也得到了体现。这也要求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加快融入全球化时，也应注重内生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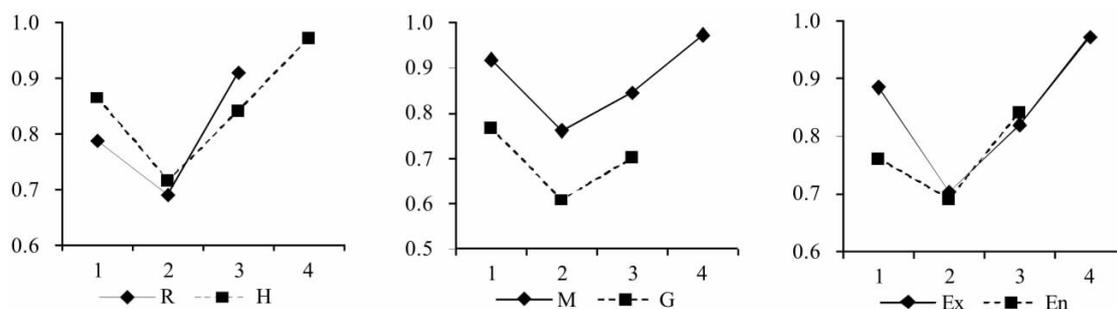


图2 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模式的平均绩效

注：图中横轴的1、2、3、4分别表示工业化初期、中期、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纵轴表示相对绩效水平；R为资源驱动型模式，H为人力资本驱动型模式，M为市场推动型模式，G为政府推动型模式，Ex为外生型模式，En为内生型模式。

四、结论

本文从要素、制度、关系三个维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分类，分析资源驱动型与人力资本驱动型、政府推动型与市场推动型、内生型与外生型模式的绩效水平，进而分析不同模式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适用性，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 一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总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即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发挥较强的优势，但随着这种模式优势减弱，也意味着这种模式即将走向消失。而任何适当的、成功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都是建立在对经济基础、功能定位等因素进行客观、准确分析，力求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前提之上的；只有认清不同其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选择当下最优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是其现实选择。(2) 从要素维度上看，资源驱动型模式短期经济效应更加明显，尤其是在对自然资源需求较大的工业化初期阶段具有较强的适用性；而人力资本驱动型达到长期经济效应更加明显，尤其是在工业化中后期或后工业化阶段，其优越性逐渐显现。(3) 从制度维度上看，在任何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推动型的经济发展绩效均优于政府推动型，而政府推动型仅在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的传统经济阶段

和工业化初期具有相对适用性。(4) 外生型模式与内生型模式并无明显的优劣之分，内生与外生因素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应向着整合全球力量、国家机构和当地环境的方向发展，这要求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加快融入全球化时，也应注重内生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系统，也是一个难以取得学术界公认的命题，尽管本文在类型划分、指标选取等方面存在商榷之处，但标准没有绝对的，我们不可能建立一个“期望的终极目标”，本文力求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提供一种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

[1] 苗长虹, 魏也华, 吕拉昌. 新经济地理学 [M]. 科学出版社, 2011.
 [2] 费孝通. 小城镇四记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5.
 [3] 李岳峰, 张军慧.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机理及其类型比较 [J]. 开发研究, 2008, 1: 29 - 33.
 [4]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s, 1993.

[5] Lall S, Albaladejo M. China's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a threat to East Asian manufactured exports? [J]. World development, 2004, 32(9): 1441 - 1466.

[6] Kurt W. Neoliberal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ern Europe [J]. Comparative Politics, 1999, 31(4): 379 - 401.

[7] Gary G. Development Model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and Mexico [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9, 25(1): 37 - 51.

[8] Nolan, P. H.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J].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2005, 3: 1 - 2.

[9] 施端宁, 陈乃车. 制度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比较分析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0, 9: 88 - 90.

[10] 许高峰, 王炜. 论我国民营经济对区域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作用——以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为例 [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2(6): 492 - 497.

[11] 应云进. 论区域经济未来发展模式再创新——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看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演进 [J]. 企业经济, 2003, (5): 116 - 118.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温州模式”的转型与发展——“以民引外, 民外合璧”战略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 2006, (6): 51 - 59.

[13] 林春霞. 温州模式会否消亡 [N]. 中国经济时报, 2011 - 10 - 26: 003.

[14] Acemoglu D, Robinson J A.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Repl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6): 3077 - 3110.

[15] Wei Y H D, Fan C C.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 [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00, 52(3): 455 - 469.

[16] Yang Dali. Pattern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0, 122(2): 230 - 257.

[17] 尚勇敏, 曾刚, 倪外, 等. 中国典型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与选择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5a, 36(02): 3 - 10.

[18] 尚勇敏, 曾刚.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内涵、标准的再探讨 [J]. 经济问题探索, 2015b, (01): 62 - 67.

[19] 张复明, 景普秋. 资源型经济的形成: 自强机制与个案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8, (5): 117 - 130, 207.

[20] 赵康杰, 景普秋. 人力资本与资源型经济关系: 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 [J]. 劳动经济评论, 2009, 11: 107 - 129.

[21] 陆大道. 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5.

[22] 金玉国. 宏观制度变迁对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J]. 财经科学, 2001, (2): 24 - 28.

[23] 李远. 政策导向与外向型经济发展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24] 陈佳贵, 黄群慧, 钟宏武, 等. 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0)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25] 魏进平. 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与定量判断——以河北省为例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8, (8): 198 - 200.

[26] 齐元静, 杨宇, 金凤君.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J]. 地理学报, 2013, 68(4): 517 - 531.

[27] 曹贤忠, 曾刚, 邹琳. 长三角城市群 R&D 资源投入产出效率分析及空间分异 [J]. 经济地理, 2014, 34(12): 104 - 111.

[28] Lin G C S. Scaling - up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globalizing China: local capital accumulation, land - centred politics, and reproduction of space [J]. Regional Studies the Journal of the Reg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2009, 43(3): 429 - 447.

[29] Bathelt H, Malmberg A, Maskell P. Clusters and knowledge: local buzz, global pipelines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4, 28(1): 31 - 56.

[30] Wei Y H D. Beyond new regionalism, beyo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making the Sunan model, China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2010, 28(1): 72 - 96.

(编辑校对: 牛蓉琴)